

■过年那些事儿·饮酒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酒的始酿

汉代人称酒为“天之美禄”，说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，既可合欢，又能浇愁，这样好的东西，究竟是何人何时发明的？说法不一，莫衷一是。

按《太平御览》引佚书《世本》：“仪狄（夏禹时代的女酒官）始作酒醪，变五味。少康作秫酒。”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·勿躬》也有类似说法。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叙说更为具体，云“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”。东汉学者许慎在《说文》中也谈及仪狄和杜康作酒，他赞成《世本》的折中说法，以为“古者仪狄作酒醪，禹尝之而美，遂疏仪狄。杜康作秫酒”。田园诗人陶渊明在《述酒》诗的序中更有高论，他说是“仪狄造（酒），杜康润色之”。

应当说，中国酒的始酿并不是仪狄完成的，最早的酒比大禹的时代要古老得多。人类初酿成功，可能起因于谷物保管不善而发芽发霉，这种谷物煮熟后食之不尽，存放一段时间就会自然酿成酒，这便是谷芽酒。偶然到必然，古人自主的酿造活动便开始了。晋代文人江统作过一篇著名的《酒诰》，他所描述的酿酒起源过程，与以上说法完全相同：“酒之所兴，肇自上皇。或云仪狄，一曰杜康。有饭不尽，委余空桑。郁积成味，久蓄气芳。本出于此，不由奇方。”（转引自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）《初学记》引《酒经》载：“空桑稷饮，酝以稷麦，以成醇醪，酒之始也”，也是同一个意思。

中国农耕文化悠久，也许农耕诞生不久便完成了酒的初酿，酿酒、饮酒的历史不会短于八九千年。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，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陶质酒具，还有不少标准的酿酒缸，这是史前时代酿酒和饮酒的最好证据。这个年代要早于大禹几千年。只不过仪狄可能是改良了传统工艺，提高了酒的浓度，使酿酒业脱离了最原始的初级阶段。仪狄的酒醇美，而大禹饮用之后反而很不愉快，因此疏远了这位创造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一种解释是，大禹生平不爱饮酒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所说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”另一种解释是，大禹远见卓识，他预见到美酒可能会带来损人亡国之祸，他饮了仪狄送来的美酒，反馈就在他当时说的那一句话中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”（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）

成也酒 败也酒

夏禹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夏代的亡国之君夏桀，以酒为池，可以运舟，“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”（《新序·刺奢》），据说他还因酒浊而杀死了庖人。如此好酒，夏的亡国不能说与此不无关系。如果夏桀亡国还不足论的话，那么商纣的灭国则完全应验了大禹的预言，这是美酒祸害的一个残酷鲜活例证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六韬》曰：“纣为酒池，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人为辈”，这群饮的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夏桀的时代。考古学家们发现，在一些商代贵族墓葬中，凡是爵、斝、觚、盃等酒器，大都同

春节越来越近了。逢年过节“无酒不成席”，“把酒言欢”，能够称得上宴席的，酒是不可或缺的饮品，所以又可称为“酒筵”。在很多场合，酒是筵宴上的主旋律，举杯开宴，落杯就要散席。但酒是从哪里来的，饮到何种程度为妙？今天我们讲一下关于酒的故事，并一起来细品酒中三昧。

古来圣贤皆寂寞 何以饮者留其名

佳节将至，透过古人言行细品酒中三昧



汉代六博图刻画了汉代人醉饮高呼的情态。

棺木一起放在木椁之内，而鼎、鬲、甗、簋、豆等饮食器皿都放在椁外，可见商代嗜酒胜于食物，他们格外看重酒器，死了随葬时也要放在离身体近一些的地方。贵族们地位和等级的区别，主要在酒器而不是在食器上反映出来，较大的墓中可以看到十件左右的青铜酒器。晚期大墓中多的可以见到一百多件酒器，一般平民墓葬则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。

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及其他史籍记载，商纣王刚即王位时，曾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，他“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”，能“倒曳九牛，抚梁易柱”，“知足以距谏，言足以饰非；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声，以为皆出己之下”。这虽不能全算是优点，但这样的他也着实不能算作昏庸的君主。不过纣王“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”，以至“以酒为池，县（悬）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”。如此纵酒，还兴出炮烙之法、醢脯之刑，良臣或被迫被杀，或至叛逃。商王朝终于为周武王率诸侯攻伐，纣王落了个自焚鹿台的下场。武王伐纣，在誓师大会上列举的纣王最严重的罪名，是听信妇人之言，纵容“牝鸡司晨”。实际上，纣王昏庸的根本原因是纵酒。西晋葛洪的《抱朴子外篇·酒诫》的论断是：宜生之具，莫先于食；食之过多，实结症瘕。况于酒醴之毒物乎！

这是说，对人体有补益的食物吃多了，尚且会危害健康，更何况酒醴之类的毒物。用现代科学来解释，纣王应当是饮酒过多而导致酒精中毒，神经错乱了。

事实上，纣王还不只是酒精中毒，恐怕同时还有铅中毒症状。商代所用的青铜酒器，乃是铜、锡、铅的合金。商纣王可能长期使用含铅量高的青铜器饮酒，摄入体内的铅大大超出正常值，可以推测他大概患了铅中毒症，从他典型的谗妄症（剖叔父王子比干之胸，挖心观验）足以看出这一点。

周人非常清楚殷商灭亡的原因，所以在建国伊始，严禁饮酒。《尚书·酒诰》记载了周公对酒祸的具体阐述，周公因此制定了严厉的禁酒措施，规定周人不得“群饮”及“崇饮”（纵酒），违者处死。包括对贵族阶层，也要强制戒酒。禁酒的结果是，酒器派不上

用场了，所以西周时的酒器出土远不如商代的多，即便在一些大型墓葬中，有时甚至一件酒器也找不到。自周公禁酒以后，历代都有过一些禁酒的法令与措施，有时是为了稳定形势，有时是为了度过荒年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。

酒中三昧

在数千年文明史上，多少可歌可泣、可爱可怜、可痛可惜、可笑可悲的重要事件，皆是因酒而演绎，酒的发挥，远远超出了它作为饮料存在的价值。循着这坛酒，造就了亡国的君主、豪爽的侠士、高隐的名士、沉湎的庸人、豁达的诗圣，乃至荒唐的罪人……

先秦时代的善饮者，应当说是不不少的，不过相较汉代，就显得有些逊色了。汉时人们普遍嗜酒，所以对酒的需求量很大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百礼之会，非酒不行。”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到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，墓室中摆有三十多口高达七十厘米的大陶酒缸，缸外用红色书有“黍上尊酒十五石”“甘醪十五石”“黍酒十一石”“稻酒十一石”等，估计当时这些大缸总共盛酒五千多公斤，这还不包括其他铜壶内的酒。

有意思的是，汉代人并不以“酒徒”一名为耻，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。如有以“酒狂”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（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），还有自称“高阳酒徒”的酈食其（《史记·酈食其传》），开国皇帝刘邦也曾是好酒之徒，常常醉卧酒店中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，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，曾因醉卧途中，被人称为“醉龙”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引《龙城录》），还有上演一巴掌拍破书案、嗜酒如命的更始帝刘玄的韩夫人（《后汉书·刘玄传》）。

汉以后的魏晋时代，很多人虽依然爱酒，可心思并不在酒上，这些人便是所谓的“名士”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引晋代一位刺史王孝伯的话说：“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。”魏晋名士专谈玄理，即所谓清谈。他们在饮食生活上也有特别表现，如鲁迅先生所说，服药和饮酒。这是魏晋名士最突出的特色，其中“竹林七贤”是这一时期名士的典型代表，上演了一幕幕一生一世亦庄亦谐、洒脱不凡、轻视世事、嫉恶如仇、隐忍内心苦痛的“酒”故事。晋人



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。

陶渊明的一生，更是与诗、酒、无弦素琴融为一体的一生。

唐代，饮酒是文人崇尚的风向标，诗人白居易嗜酒，自称“醉尹”。到了六十七岁时，退居洛阳香山的白居易仍长饮不辍，自名头“醉吟先生”，以酒为乐。他还作了一篇《醉吟先生传》，描写自己闭而诗，诗而吟，吟而笑，笑而饮，饮而醉，醉而又吟的所谓“陶陶然，昏昏然，不知老之将至”的情态，尽管“鬓尽白，发半秃，齿双缺；而觴咏之兴犹未衰”。

盛唐时期就有“酒八仙”之说，称嗜酒的贺知章、李璣、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八人为酒仙。杜甫所作《饮中八仙歌》，概略述及了八仙的酒事。焦遂有口吃的毛病，平时结结巴巴一句话也不说不顺溜，可是喝完酒后，立马高谈阔论，问答如流，堪称一桩怪事。

八仙中嗜酒最为著名的当然首推李白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，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那种意境，那种感觉，那种心情，酒中自有万古幽情；还有那一曲千古绝唱《将进酒》，人们多以为作者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，但它实际上是灵魂深处回荡的一曲痛苦悲歌和冲天豪气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……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……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……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

赞佩酒八仙的杜甫，也是一个并不亚于八仙的酒客。杜甫流传至今的诗，大约占他所写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的五分之一，有三百首之多，比起李白来要多出近一倍。他的《水槛遣心》诗云：“浅把涓涓酒，深凭送此生。”

酒到底到什么程度合适？饮到什么程度才能领略到酒中趣味呢？自宋代开始，人们比较强调节制和礼饮，清人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》中，曾几度议论到这个问题。在《邵雍诗》一节，他援引宋代邵雍的诗句说，“美酒饮教微醉后，好花看到半开时”，以为这话说得“真快活煞人”，他赞同酒只能饮到微醉之时。在《酒犹兵》一节，他又援引宋人费衎的话说：若一饮径醉，酩酊无所知，则其乐安在耶？教人饮酒不要大醉，美在“欲醉未醉”时，这对当下饮酒适度与否不是很好的劝诫吗？